

中国“文革”发生和“苏联解体”原因之探讨

高 鸣¹, 张 丽²

(1 昆明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云南 昆明 650031; 2 云南中医学院 社科部, 云南 昆明 650200)

摘要: 中国“文革”与“苏联解体”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两大历史事件。这两个重大事件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和内在逻辑共性, 其共同的深层原因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形成的党内上层矛盾分裂所致。因此, 如何加强和搞好民主政治建设, 特别是党内民主建设, 是我们从以往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中应吸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 苏联解体; 党内矛盾; 社会主义实践; 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0)01—0100—05

Probe into Reasons of“Cultural Revolution”Occurrence in China and Disintegration of Soviet Union

GAO Ming, ZHANG Li

(1. Thought &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31 China

2.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Yunnan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Yunnan Kunming 650200 China)

Abstract: China's“Cultural Revolution”and“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are two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here exist seemingly difference but actual similarity and internally logical generality between them, which has the common deep reason for the problem“what is socialism, how to build socialism”. On which led by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 among the upper leaders of the party. Therefore how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building of democratic politics, especially building of inner party democrac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s t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past practice of socialism. Key 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ner party contradiction; socialist practic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中国“文革”和“苏联解体”这两大历史事件, 对于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来说, 也许已是历史陈迹和父辈们讲述的遥远故事, 但对我们这辈人来说, 却是挥之不去的沉甸甸的历史记忆和挂在心头的难解和未解之谜。不仅如此, 谁又敢断言类似的历史悲剧不会重新上演。有一句古老格言说得好:“那些拒绝记取历史教训的人将注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恩格斯有言, 没有什么学习比从自己以往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更直接和重要。历史是面镜子, 以史为鉴, 鉴往知来, 面向未来, 咨政育人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本分和天职。历史并不虚无, 研究历史要有现实感, 研究现实要有历史感。因此, 深入两大历史事件的深层, 探讨其发生的主要原因,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判断历史是非, 通过探讨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 认真吸取经验教训, 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 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一、两大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架构探析

发生于四十多年前的我国“文革”与发生于 18

年前的“苏联解体”, 分属不同历史时空, 表面上看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串联起来比较, 似有牵强附会之嫌。目前, 对于“两大事件”分说分讲的著作已很丰富。而学术界在对这两大历史事件发生原因的探讨和解释上, 亦有“单因说”, 也有“多因说”; 有“内因说”、“外因说”, 亦有“内因加外因说, 内因为主说”。可以说,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见解各异。如果把两大历史事件放到全景式历史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便能寻找出事件发生的各不相同的具体原因背后的深层和共同的因素。

中苏两国是 20 世纪先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两国社会主义中, 政党和国家唇齿相依, 党内组织原则都是采取和实行“民主集中制”; 两国也同是追赶型、压力型国家, 特别是有冷战与西方施压的历史背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架构内, 中苏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发生的这两大历史事件,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和内在逻辑共性, 二者有着共同的深层的根本原因。由于同属共产党执政

收稿日期: 2009—09—17

作者简介: 高鸣(1959—), 男, 山西洪洞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哲学研究; 张丽(1963—), 女, 云南昭通人, 硕士, 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是追赶型、压力型的发展国家, 所以, 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必然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及在社会实践碰到的困难与问题引发。特别是在如何发展经济和生产动力问题上, 在执政党内部产生思想认识分歧、矛盾甚至对立, 并形成不同的政治意见及派别, 直至在执政党内部、高层形成不同的政治路线。面对党内高层的分歧、矛盾和不同的认识路线, 执政党未能通过党内充分的民主机制得以解决, 于是党内矛盾社会化, 继而引发社会各种矛盾的全面爆发, 并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大崩溃”或“解体”。

所以, 通过对“两大事件”的经验沉思及理论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党内, 特别是党内高层或上层。^[1]对此, 毛泽东在“文革”前对某军区负责人谈话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文革”中又对青年说,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邓小平作为党内上层元老, 可以说对此是明察秋毫, 深谙此道。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刚解体时, 他在谈话中就说: “苏联的问题出在党内, 对此要清醒”。1992 年南巡讲话又说“中国不出问题则已, 出问题就出在党内”, “关键在党”。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要对“中国‘文革’发生和‘苏联解体’之原因进行再探讨的原因, 也是我党现今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建设的原因。

二、我国“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探讨

毛主席曾说过, 我一生之中做过两件事, 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小岛, 另一件就是发动“文革”。对前件事争议不大, 对后一件事争议不少, 议论很多。毛泽东到晚年急于想把后一件事即“文革”铁板钉钉定下来, 要求和希望邓小平不要翻“文革”的案, 并发表声明或起草决议拥护“文革”。邓小平说, “文革”不久, 我已是“桃花源中人”, “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委婉推脱。1976 年毛泽东辞世, “四人帮”被粉碎, 随后真理标准大讨论, 全党工作中心转移, 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文革”给予了官方评价, 把其定性为: “‘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

“文革”肇始于 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 两次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此后这一长达十年、全局性的“文革”运动过程大致分三个阶段: 从“文革”发动到 1969 年 4 月党的“九大”为第一阶段, 从“九大”到 1973 年党的“十大”为第二阶段, 从党的“十大”到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覆灭为第三阶段。

对于“文革”的起因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对此官方和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大体如下: 1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本依据的官方说法。直接原因: 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失误, 历史原因: 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 封建专制主义流毒的影响, 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遭破坏。2 学术界诸种探讨。第一类意见认为, “文革”发生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矛盾发展的结果。第二类意见认为, “文革”是一个没有社会历史根源的偶发事件, 它主要由中共的领袖毛泽东的个人过失造成。第三类意见是, 这纯属党的内部争权夺利所致。第四类意见认为, “文革”发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表现, 也不是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和过失造成的, 更不是什么个人思想和争权夺利, 原因不易搞清, “神秘和不可知”。第五类意见则认为, 中国共产党内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认识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潮的恶性发展、并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是‘文革’爆发的主要原因。^[3]其实, 官方决议最为正确, 但过于简略和粗放, 需要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 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观点虽各有千秋, 但皆有偏颇, 部分正确, 不全对。

因此, “文革”的起因至今仍然是困惑着很多人的一个大问题。如“八大”决议已明确宣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后, 阶级斗争问题为何在中国共产党内又重新提出和强调, 难道仅仅由于长期的习惯吗? 显然, 对“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之脉络需进一步研讨, 准确摸清和科学把握。而要真正搞清“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 应到“文革”爆发前的十年历史实践中去寻求。对此《“文化大革命”史稿》正确地指出: “‘文革’是其发生的前十年国内外蕴聚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文革’前十年的历史曲折复杂, 经验极其丰富,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上溯其源, 盖出于此。”^[4]何以见得? 从 1956 年中共“八大”后的一串运动史可预见“文革”的发生。从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整风整社运动、农村四清运动、城市五反运动、文化批判运动、国际反修运动等, 运动发展像一连串珠子连接着“文革”前十年的历史。其间, 在 195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召开的党的“八大”, 正确地指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于是通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抓经济建设。随后, 在受挫以后, 后退及问责, 又提出了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方针。而上世纪 60 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 则实属三分天时, 七分人祸。在检讨这些问题时, 党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 特别是怎样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上发生了根本对立的思想和政治分歧。为了解决党内上层的所谓“不同的政治路线”,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

重提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将党内矛盾误植为敌我矛盾，“习惯而又应用自如”地启用阶级斗争方法。阶级斗争的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取得过伟大的成功。但在条件和矛盾的性质发生质变后，又重新拿起这个武器，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后来发展到践踏党内民主、个人专断与崇拜、重新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划线站队、“炮打司令部”，乃至“文革”升级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革命，“专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造成十年的“文革”内乱。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不同认识和看法是必然的，在党内形成分歧是正常的。如果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意见没有正常的、有效的解决途径和机制去加以正确处理，当党内出现重大分歧时，往往不是根据党内有关规定和国家法律来解决，而是通过政治权力斗争来解决，处理党内矛盾无法可依、无据可寻，必然导致政治权力斗争通过非制度化、非常规的手段解决。矛盾尖锐化后，最终导致党内矛盾社会化、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完全运动化，造成十年“内乱”与“浩劫”。

因此，如何把政治稳定与政治建设统一起来，搞好政治文明建设，积极稳妥地加快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党内矛盾，特别是党内上层矛盾，是经济建设、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及党和国家工作正常运转的根本保证。这是我们现阶段从“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的探讨中所要吸取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

三、苏联演变与解体过程及原因之探讨

大国的兴衰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像苏联这样出人意料并带有悲剧性的衰落却甚为特殊。有人形容，这是一场“政治大地震”、“突然崩塌和散架”^[5]。当1991年8月24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时，具有93年历史、执政70年、拥有1500万党员的苏共迅速瓦解。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以外的苏联11个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字认可，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苏联解体。这一“解体”过程的特征是“过程迅猛，相对和平”。人们没有预想到会发生这样震惊世界的事件。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分析家和研究者依然感到困惑，究竟是哪些因素或原因导致了如此强大的国家的迅速解体和消亡。无论是解体的过程，还是解体的原因，都非同寻常。这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和争论。对这样“一笔历史糊涂账”，今天仍需要认真梳理澄清。那么前

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应为何如呢？

（一）国内一因一果说

第一种说法认为，苏联演变解体是由于意识形态出了问题^[6]；第二种认为是由于经济没搞好；第三种观点是，领导者推行和奉行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后一种则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和关键原因归结于执政党的变质。

“第一”和“第三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把“解体”这样复杂的事件归结为思想认识和政治路线问题似有不妥。第二种观点虽然简单直接，但是却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第四种观点看到了问题所在，但过于笼统。

苏联“解体”之后，从我国的一些讨论会、报刊发表的文章中经常可看到这样一种倾向：当需要强调什么工作，抓什么问题时，有人就拿苏联解体来作简单类比归因。例如：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就说苏联的演变正是因为经济没搞上去所造成的；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就是说“左”葬送了苏联；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说苏联是因为没有搞好改革、没有搞市场经济才垮台的；抓反腐败，就说苏联是因为腐败、以权谋私而瓦解的；如此等等。这貌似总结经验教训，但实际是把一个严肃课题的科学研究简单化和实用主义化了。

（二）国外的一因一果说

1 经济崩溃论

这个观点把苏联垮台归因于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造成的。这种解释不能自圆其说的证据就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垮台前有六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虽然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遇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困难，但其经济还是在增长，尽管80年代末增长速度有所减慢。

2 群众革命论

这观点认为，苏联垮台和解体的原因在于民众对该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反感、反对。依此来看：苏联是强权社会，人民早已不满，改革给人民以机遇，受压迫的人民把票投给了资本主义；受压迫的民族主义从莫斯科的藩篱中获得了自由和独立。但1991年的“全民公决”的民意表明，只有少部分的苏联人想要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参加的公民数量占法定人数的80%，其中投票支持保留苏联的公民占76%。^{[7][38]}所以，这样的解释有严重的不实之处和缺陷。

3 外在压力论

许多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始终相信正是“冷战”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施压才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承受不了科技、军备、经济的竞赛成本，遭受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失败，即外在压

力动摇了苏联。^{[7] 236}毫无疑问, 冷战、西方的施压、和平演变的推行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但是以苏联以往历史和美国的近邻古巴为例, 我们没有理由将其认为是主要原因。

4 戈尔巴乔夫个人过错导致说

苏联解体后, 戈氏遭到许多人的情绪化的谩骂和指责, 说戈氏欺骗了所有的人, 其很早就已经走到苏联和苏共的反对阵营中去了, 背叛了党, 如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的指责^[8]。此论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人。原苏中央委员写的《苏联的最后一年》也持此说, 认为戈氏错误安排工作重点, 民主改革“操之过急”, 意识形态薄弱, 班子软弱无能, 错失改革和发展良机及不尽职, 没有意识到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等等。

5 戈氏与叶氏争权夺利说

这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因素说, 主要是指事件当事人戈氏与叶氏之间的相互攻讦与斗争。最初几年(1987~1988年)这种争斗还限于苏共党内, 到后来(1989~1991年), 叶氏公开对戈氏进行攻击, 而“戈氏没有对‘叶利钦帮’及叶本人开展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斗争”。叶利钦一直将苏联灭亡的责任推到“苏共保守派”和戈氏的身上, “从未对苏联和苏共的解体表示过任何遗憾和惋惜之情”, “叶的唯一武器就是对特权的煽动性的批判, 对此他讲的很好”。戈氏本人也从不承认自己希望苏联解体, 甚至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在客观上促使了这场灾难的发生。他将苏联解体的责任推到叶氏民主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的“叛乱分子”的身上, 推到雷日科夫等领导的政府身上。戈尔巴乔夫说: “我对苏联的解体不负任何责任, 这就是历史。”“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苏联解体呢? 戈认为首要原因就是叶利钦及其班子所实施的政策, 他们于 1990 年夏进入俄联邦政权后, 推行破坏苏联路线, 向法律宣战, 掀起了主权国家的独立浪潮。”

如何看待戈与叶的相互推诿和攻讦? 如何看待戈氏在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中所起的作用和所负的责任? 笔者认为, 戈尔巴乔夫作为主要领导难辞其咎, 但完全归咎于个人, 也不公正, 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苏联的最后一年》的作者的评论, 笔者认为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我们可以看到戈从未将瓦解苏联和解散苏共作为自己工作的公开或者是秘密的目的。在最初阶段, 戈氏力图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和加快苏联的经济发展。此后, 他以‘人道’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决定促进苏联和苏共的民主化进程……但戈氏没有掌握控制像苏联和苏共这样复杂机器的必要技能。戈的错误很多,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 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7]。有人说戈氏是打着改革和复兴苏联体制的旗号, 实际干的是破坏它的勾当, 这不正确, 戈氏是诚心想要革新苏联社会主义的。

6 上层革命说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

的作者把苏联垮台解释成: “一场得到苏联党——国家精英支持的资本主义革命, 并不是说这是几个主要高层官员秘密操纵的一场阴谋。”这种观点把苏联解体和垮台解释成来自上层的革命。这里的精英指的是苏共、政府和其他官方组织中的高级官员, 加上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富有者。这一新集团阶级联盟人数虽少, 但控制力强, 影响和支配力大。^[9]

(三)“主因多因”说

国外学者《苏联的最后一年》认为: “意识形态的衰落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是还存在其它许多因素刺激并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进程。”^{[7] 226}国内学者认为主因是“以戈为首的执政党的苏共领导集团, 执行了一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 是导致苏联演变的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其它因素只是提供了可能和条件”。^[10]

陈之骅先生在《苏联兴亡史纲》的观点认为“关键在于选择了方向性错误的改革路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主因)。其他因素(原因)主要概括为七点: 1 缺乏改革的绝对准备; 2 对苏联国情缺乏了解; 3 对改革的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缺乏思想准备; 4 用行政命令方式搞改革; 5 忽视民族问题; 6 “左”、“右”倾思潮和政治势力的影响; 7 忽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11]

(四)多因一果说

苏联演变和解体是一个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 其中: 有国际的因素, 也有国内的因素; 有党内的因素, 也有党外的因素; 有历史的因素, 也有现实的因素; 有政治的因素, 也有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因素等。

总之, 在冷战和西方的外在压力下, 戈氏上台后, 苏联开始实施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战略”。由于执行不顺利, 没达到预期目的, 由此引出高层对两大问题的思考: 一是党内政治及干部问题; 二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围绕这两个主要问题, 苏共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意见分歧, 进而形成了在不同思想基础上的派别集团。主要有三派: 一是以雷日科夫为首的“稳健保守传统派”; 二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主流派”; 三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激进派”。在“公开性”和“民主性”的“助燃”下, “潘多拉”盒子被打开, 苏共党内上层分歧矛盾公开化、白热化。特别是在十九次党代会和第一次人代会上, 导致上层政治路线与派别的政治博弈, 各派都寻找时机并利用各种社会矛盾及可利用的“阵地”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以反对对方。而“独联体”问题激化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最终导致了 1991 年 8 月 19 日事件的发生, 结果是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政权更迭、社会剧变。这种变化, 遵循着与中国“文革”发生的大体类似的“逻辑”而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悲剧”，教训不可为不深。其中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对导致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也值得再反思和再探讨，这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立新. 苏共兴亡论[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73—79.
[2] 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注释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30.
[3] 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史稿[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4.
[4] 肖冬连.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上册[M].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99: 3.
[5] 许兴全. 毛泽东与 20 世纪哲学革命[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

社, 1998: 585.
[6] 曹长盛. 苏联演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7] 罗亦·麦德维洁夫. 苏联的最后一年[M]. 王晓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8] 薛小荣, 王哲. 苏联政要们眼中的戈尔巴乔夫、苏联改革与剧变[J]. 新华文摘, 2005(9): 25—28.
[9] 大卫·科慈.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 曹荣湘,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0] 周新城、张旭. 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1] 陈之骅. 苏联兴亡史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83—790.

（上接第 99 页）

的合理性追求。把自利与利人结合起来，抑制寻租及腐败。第二，从制度上约束政治过程中的“经济人”趋向。从体制创新入手，加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法治建设。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运行必须靠法律来保证，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必须靠法律来规范。依法建立起一个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管理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和寻租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第三，“阳光行政”，事前防腐。腐败、寻租等丑恶现象运作条件就是暗箱操作。暗箱操作与现代民主政治背道而驰。列宁指出“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其一，完全的公开性；其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因此行政机关要向社会公开其除机密以外的文件，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建立财产申报制，公开公务员及其配偶的财产收入，增加行政工作透明度，保证每个公务员时刻处于严密的社会和舆论监督之下。

我国政府运用公共政策在对全社会利益进行调整和分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政府利益的客观存在，公共政策制定者会按照“理性经济人”的思维

方式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式，所以还是会出现政府利益的错位和偏离现象，导致公共政策的失误。有些甚至严重违背了政策的公平、公正原则，影响公共政策效率和全民福利提高。我国政府与民众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政府的政策取向应基于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利益考虑。在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中，这些发展中的问题会在发展中不断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 丹尼斯·缪勒. 公共选择理论[M]. 杨春学,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
[2] 保罗·萨缪尔逊. 经济学[M]. 第 12 版.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182—1186.
[3] 沃尔夫. 市场或政府: 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 39.
[4] 杨秋宝.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效分析[J]. 经济学家, 1994(6): 9—12.
[5] 夏义堃. 非对称信息环境下政府决策行为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6): 45—47.